

《傅子》

〔晋〕傅玄 撰
刘治立 评注

评注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《傅子》评注

[晋] 傅玄 撰 / 刘治立 评注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《傅子》评注 / (晋) 傅玄撰；刘治立评注. —天津：
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10. 3
ISBN 978-7-80696-764-5

I. ①傅… II. ①傅… ②刘… III. ①政治思想—中
国—西晋时代②傅子—研究③傅子—注释 IV.
①D092. 3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243298号

《傅子》评注

(晋)傅玄/撰 刘治立/评注

出版人/刘文君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)

<http://www.tjabc.net>

E-mail: tjgj@tjabc.net

三河市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10.75 字数270千字

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96-764-5

定 价：35.00元

《傅子》评析

FU ZI PING ZHU

傅玄是魏晋之际著名的学者，《晋书·傅玄传》称，傅玄博学善著文，一生著述不废，作品颇丰。《傅子》是傅玄最为重要的作品，也是他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一部政论、道德论和史论文集。

最早记载《傅子》的是《晋书·傅玄传》：“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，评断得失，各为区例，名为《傅子》，为内、中、外篇，凡有四部、六录，合百四十首，数十万字，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。”^①《傅子》诸篇文章主要完成于三国魏后期，内篇完成后，傅玄之子傅咸曾送请侍中王沈看，王沈与傅玄书曰：“省足下所著书，言富理济，经纶政体，存重儒教，足以塞杨（朱）、墨（翟）之流遁，齐孙（孙卿，即荀况）、孟（轲）于往代，每开卷，未尝不叹息也。‘不见贾生，自以过之，乃今不及’，信矣！”^②王沈任侍中是在正元年间（254—256年），可见入晋之前，《傅子》的主干内容已经完成。在这期间，王沈文名甚盛，又与傅玄一样心向司马氏，这是傅玄要让王沈过目的原因所在。司马昭即王位后，王沈、傅玄都被召回重用，二人过从甚密。《晋书·傅玄传》记载，傅玄任职温令、弘农太守期间，“数上书陈便宜，多所匡正”。《傅子》内篇中无疑包含有“上书”“匡正”的内容，或者就是经整理补充后的结集。其宗旨是既“陈便宜”，又有所“匡正”，这应是给司马氏献策献谋，而不是向高贵乡公曹髦进言。今存《傅子》较完整的内容，即《群书治要》所存二十七段文字、赵蕤

① 《晋书》卷四七《傅玄传》。

② 《晋书》卷四七《傅玄传》。



《长短经》另录四段文字，共计三十一段文字，正是内篇遗文。魏徵在《群书治要》里大量征引《傅子》文字，又可以从唐朝建国之际的借鉴角度，证明这些文字确是内篇的遗文。

傅玄曾经参与编纂曹魏国史，“州举秀才，除郎中，与东海缪施俱以时誉选入著作，撰集《魏书》”^①。《马先生传》很可能就是傅玄在“除郎中”之后“选入著作”时的交卷之作，根据《通典·职官·秘书监》“晋制，佐著作始到职，必撰名臣传一人”的记载，晋制应是沿袭曹魏成例。刘知几认为：“魏史，黄初、太和中始命尚书卫凯、缪施草创纪传，累载不成。又命侍中韦诞、应璩、秘书监王沈，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、司徒右长史孙该、司隶校尉傅玄等，复共撰定。其后王沈独就其业。”^②傅玄参加修纂的《魏书》最后由王沈完成，这段撰史经历对《傅子》的史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傅玄参撰的《魏书》在《傅子》中有无体现，成为古今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。《傅子》的内容多半散佚，其严整的编纂体例自然不得而知。清代学者根据《晋书·傅玄传》的相关记载，努力探讨傅子的内容和编次方式。严可均认为，《傅子》内、外、中篇各有侧重，“问《傅子》为内、外、中篇，有四部、六录，云何区别？内篇撰论经国九流，外篇三史故事，评断得失，中篇《魏书》底本，而以《自叙》传终焉”。严可均还认为：“百四十首而百二十卷者，或元有缺篇，或数篇合卷，今莫能详。”^③他认为《晋书·傅玄传》中所谓的“百四十首”，指篇数；而宋以前著录“百二十卷”指的是卷数，二者不是一回事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郭嘉传》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曰“语在武纪”，这句不经意的引语激发了清代学者浓厚的兴趣。严可均根据这句引语认为“此篇题当云《太

① 《晋书》卷四七《傅玄传》。

② 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。

③ 严可均：《重辑傅子·序》。

祖武皇帝纪””。因而《全晋文》所辑《傅子》四卷，有意将这些文字集中排列，自卷三末至卷四末，并以按语予以说明。卷三末有四条，即涉及荀攸、袁涣、华歆、曹仁、诸葛亮者；卷四《自叙》前有三十三条（篇），有的原是分见成条而共涉一人事迹者，因连缀成篇，如管宁、郭嘉、刘晔、傅嘏等传记史料即是。这些汇集排列的史料，绝大部分来自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，也有个别条目取自《北堂书钞》《太平御览》《意林》等处。钱保塘在校语中根据《郭嘉传》注引及其他几条材料认为，裴氏注引的《傅子》文字是傅玄当年编修《魏书》的材料，“其书有纪传、序论矣。今以魏武、明事，应归之纪；记述三国时人者归之传，继以序论，其杂论史事及时事者，总为杂录附于后”。傅玄曾参撰《魏书》，后来未能完稿，钱保塘认为傅玄所写的《魏书》书稿就收录在《傅子》中，“傅元（玄）所撰录，其各有所见者，则入之《傅子》，故其书体例特近史”。

魏明安、赵以武在《傅子评传》中提出了较为可信的意见：内篇为“撰论经国”的内容；外篇、中篇为撰论“九流、三史故事”的内容，因遗文不多，已难强为区别；《魏书》底本肯定收入了《傅子》一书，或为中篇的组成部分。内篇“撰论经国”之理，中篇或为撰论包括《魏书》在内的“三史故事”。傅玄“撰集《魏书》”的时间是在他初入仕后。曹魏时几次组织人力修撰《魏书》，其上限应自汉献帝建安改元算起，上续《东观汉记》的下限，即汉灵帝之末的记载。因此，《傅子》中凡涉汉末桓、灵之世的文字，不应归于《魏书》的撰述范围。例如关于灵帝时卖官事、桓帝时梁冀事，应属《晋书·傅玄传》所指“三史故事”，而不是《魏书》中文字。从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的情形来看，傅玄“撰集《魏书》”的文字收入到了《傅子》中。《魏书》底本应为统称“三史故事”中的一部分，或为中篇同时收入。《傅子》记三国史事，以曹魏为主，兼及蜀、吴。曹操未及称帝，仍是汉献帝的丞相，傅玄虽然称曹操为“太祖”、“武皇帝”，亦偶然在曹操旧属



(如刘晔)后事中道及“文帝”(曹丕)、“明皇帝”(曹叡),但主要还是反映汉末这段历史的,承续的是《东观汉记》的记载,属于“三史”的补充内容。也就是说,《魏书》内容包括在“三史故事”之中,与其他评断前史记载的文字共成一篇,或为“中篇”,是撰论史事的合篇。《傅子》外篇或为撰论“九流”的杂记。《傅子》存文中,除了政论色彩较为浓厚的内篇没有疑问外,撰论史事的内容或为中篇,其余则为外篇。《晋书·傅玄传》所称“九流”,泛指各家学说,包括对诸子学说的评议,前代史籍撰述的论断,以及各种典章制度方面的意见等,应当属于杂记性质。《傅子》的主要内容是入晋以前完成的,少量文字是人晋以后补充而成的。《魏书》是正始年间傅玄担任史官时修撰的,内篇是高贵乡公在位、司马昭执政期间写成的。除《魏书》外,其他撰论“三史故事”的文字,成于史官任上的可能性最大。内篇、中篇完成于入晋以前,而外篇的一些内容,尤其是议论礼乐方面的文字,可能是西晋以后所作,这跟他的任职有很大关系;外篇、中篇有可能修订补充于入晋以后,或有新增内容,但所占的比重不会很大^①。

二

《傅子》一书的内容及篇幅,除了《晋书》本传所记载外,历代正史的《经籍志》《艺文志》以及其他官私目录著作也多有涉及,今摘其要者如下:

《隋书》卷三十四《经籍志三》“子部·杂家”：“《傅子》百二十卷。晋司隶校尉傅玄撰。”

《旧唐书》卷五十一《经籍志下》“丙部子录·杂家”：“《傅子》一百二十卷。傅玄撰。”

^① 参见魏明安、赵以武：《傅玄评传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87—92页。

《新唐书》卷六十五《艺文志三》“丙部子录·杂家”：“《傅子》一百二十卷。傅玄。”

唐代马总《意林》卷五：“《傅子》一百二十卷。”

《宋史》卷二百〇五《艺文志四》“子类·杂家”：“《傅子》五卷。晋傅玄撰。”

北宋仁宗时张观、王尧臣、欧阳修等编《崇文总目》：“《傅子》五卷，二十三篇。”

南宋孝宗时期编《中兴馆阁书目》载录：“《傅子》五卷，二十三篇。”

南宋郑樵《通志》卷六十六：“《傅子》五卷。晋司隶校尉傅玄撰。旧有百二十卷。”

南宋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有《傅子》著录，不载卷数。

宋末元初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一四“子部杂家类”：“《傅子》五卷，二十三篇。”并引《崇文总目》：“晋傅休奕撰，集经史治国之说，评断得失，各为区例，本传载内、外、中篇，凡四篇亡录（按：‘四篇亡录’当为‘四部’、‘六录’），合一百四十篇，今亡一百一十七。”

清乾隆年间所编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九十一“子部·儒家类一”：“《傅子》一卷。晋傅玄。”四库馆臣依据《永乐大典》所收，总为一卷；又据他书征引，辑得四十余条，作为附录。

《书目问答补正》（清张之洞原撰，范希正补正）卷三“子部·儒家类·议论经济”：“《傅子》一卷。晋傅玄。聚珍本，杭本，福本。”范希正补：“指海续刻本。严可均辑本四卷，刻《全晋文》内；又，湘潭叶德辉刻本三卷，订误一卷。”“聚珍本”指清乾隆中排印的“武英殿聚珍版”。“杭本”又名“浙江本”；“福本”又名“福建本”，同属“武英殿”本系统。“指海续刻本”是指清道光中钱祚熙增补而成的三卷本。

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、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著录：清方濬师集校《傅鹑觚集》五卷，附校勘记一卷。其中前二卷为《傅



子》。

清代以来诸家辑佚而出的各种《傅子》版本，有一卷、二卷、三卷、五卷等，均于《中国丛书综录》（上海图书馆编，中华书局1959、1961、1962年分三册先后出版）中“总目”、“子目·子部·儒家类”可查得^①。

根据以上诸种著录可知，《傅子》原有一百四十篇，分为内、外、中三个部分，共一百二十卷。

今所见《傅子》中内容首尾完具的文字，主要见于：

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，计五十八条。

唐魏徵：《群书治要》，计二十七段（无篇名）。

唐赵蕤：《长短经》，计五篇（段）。

唐杜佑：《通典》卷九十二、九十四“礼”，计二篇。

明《永乐大典》中有篇名者二十四篇。

此外，还有一些零星片断，甚至仅为只言片语，在《北堂书钞》《艺文类聚》《初学记》《太平御览》等大型类书里。唐马总《意林》里集中摘录的文字也不少，共有九十五条之多。在一些经史著作或其注疏中也时有《傅子》的文字，如司马贞《史记·平准书索隐》：“汉世贱乘辎，今则贵之。”马总《意林》则谓：“汉世贱辎车，而今贵之。”司马贞与马总都生活在唐朝，都应该能见到较为完整的《傅子》写本，大概是传抄之误，才出现语句上的歧异。

《傅子》的内容涉及面很广，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：

政论、法制论、经济论，如《治体》《问政》《问刑》《授职》《重爵禄》《安民》等。《傅子》是一部以政论、史论为主的综合性著作，着重讨论了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，如法制与礼制的关系、历代政治措施的得失、职官的选拔与任用、官员爵禄的轻重、国家赋役的征收、安定民众的有效途径等。傅玄是一位务实的政论

^① 参见魏明安、赵以武：《傅玄评传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第73—74页。

家，与奢谈虚无、漠视政教的时代表风不同，在政治观念上倾向于政治伦理化，他反对俗儒“重礼毁刑”的观点，主张礼刑兼用，德威并举，根据不同的社会条件确定礼刑的侧重点，“治世之民，从善者多，上礼德而下服其化，故先礼而后刑也。乱世之民，从善者少，上不能以德化之，故先刑而后礼也”^①。傅玄发扬了荀子“礼法并用”思想，认为“礼法殊途而同归”，这与汉代儒家所谓的“内圣外王”之道相合。因此，政论、法制论、经济论占《傅子》现存完整篇幅（内篇）的大部分，也最受后人的重视。

道德论、修养论，如《问政》《仁论》《礼乐》《正心》《戒言》《义信》《贵教》等。在《戒言》中，傅玄强调君王好德的重要性，指出“上好德则下修行，上好言则下饰辨。修行则仁义兴焉，饰辨则大伪起焉，此必然之征也”。傅玄提出“经之以道德，纬之以仁义”，就是要用儒家的仁义道德作为行动的准则。要以仁济天下。“仁者，盖推己以及人也，故己所不欲，无施于人”^②，“仁”的修持旨在形成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。要以礼来维护社会秩序，“立善防恶谓之礼”，礼关乎大本，“能以礼教兴天下者，其知大本之所立乎”^③。傅玄认为“信”是取得成就的基本前提，“王者体信，而万国以安；诸侯秉信，而境内以和；君子履信，而厥身以立”^④。从历史上看，有作为的帝王都是对人民守信的，“古之圣君贤佐，将化世美俗，去信须臾，而能安上治民者，未之有也”^⑤。信是不可须臾抛弃的。

人物论，如《郭嘉传》《刘晔传》《马先生传》《傅嘏传》《管宁传》等。三国时代是一个俊才云蒸的时代。为了在鼎足之际增强国力，拓展疆土，各国统治者都竭力网罗人才。选拔人才促使

① 《傅子·法刑》。

② 《傅子·仁论》。

③ 《傅子·礼乐》。

④ 《傅子·义信》。

⑤ 《傅子·义信》。



人物品藻的风气更加盛行。魏国品评人物的风气很盛，这也主要是由于选拔人才的实际需要。《傅子》中的人物传论，无论是记言还是记事，态度均认真严谨，文字无论长短，事理无论简繁，均能剪裁得当，条理明晰。

在人物品藻方面，傅玄注意寓论断于叙事之中。傅玄既重视才干，又推重道德，对当时一些有高才隽德的历史人物给予很高的评价。《郭嘉传》记述一位曹操重要谋士郭嘉的生平及其智谋奇策，称之为“世之奇士”，特别是官渡之战前分析曹袁双方“十败十胜”的宏论，气势雄迈，一气呵成。在记载郭嘉英年早逝，曹操对郭嘉的追念不已时，傅玄写道：“太祖又云：‘哀哉奉孝！痛哉奉孝！惜哉奉孝！’”《三国演义》第五十四回将这段话用在赤壁惨败后的仰天恸说中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奇效，增加了历史的悲壮气息。此外，刻画“独任才智”的刘晔、“达治好正，清理识要”的傅嘏、“达治知变，正而有谋”的诸葛亮，都是很成功的。

学术论，这一部分内容主要从一些文章片段里反映出来。

首先是论学说，傅玄多次谈及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看法。他认为儒家学说优于其他诸家学说，“圣人之道如天地，诸子之异如四时。四时相反，天地合而通焉”。同时，傅玄也没有拘泥于经学的影响，他认为要博取诸家之长，不可拘泥于一家之说，应当吸取其他学说的优秀成分，而不应当互相贬低，“见虎一毛，不知其斑，道家笑儒者之拘，儒者笑道家之放，皆不见本也”。当然，傅玄还是学有所宗的，他以儒家观点作为主导思想，对于墨家学说，尤其是“兼爱”、“节葬”的观点持反对态度，“墨子兼爱，是废亲也；短丧，是忘忧也”。

其次是论著述，傅玄“专心诵学”，对先秦、秦汉著作多有涉猎。在《傅子》中对许多著作发表过独到的见解。傅玄追述孔子死后“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，谓之《论语》”，认为《论语》是“圣人之至教，王者之大化，《乡党》则有朝廷之仪、聘享之礼，《尧曰》篇则有禅代之事”。傅玄称赞《汉书》为“命代奇作”，批

评桓谭《新论》“烦而无要，辞杂而旨诡”，他认为《管子》中有许多管仲的身后事，可以判定是后人所加，“管仲之书，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，乃说管仲生后事。其《轻重》篇尤复鄙俗”。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。在傅玄之后，许多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。《困学纪闻》卷十征引了傅玄的意见后表示赞同傅玄的说法：“俗古史谓多申韩之言以智欺民，以术倾邻国，有不贵之宝，璧之青茅之谋，使管仲信然，何以霸哉？”

《傅子》的学术思想归类问题，存在着两种看法。一种是将其归入“杂家”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等将《傅子》归入“子部·杂家”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“杂者，兼儒、墨之道，通众家之意，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。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、祸福存亡之道。然则，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。放者为之，不求其本，材少而多学，言非而博，是以杂错漫羨而无所指归。”“杂家”源出史官，论“祸福存亡之道”“王者之化”。唐魏徵《群书治要》、赵蕤《长短经》收录傅玄诸多文字，也是从“王霸”角度考虑的。唐朝时期《傅子》原貌尚存，时人将之归入“杂家”，可能是在全面占有材料基础上的归纳，是值得信赖的。魏明安、赵以武认为，《傅子》应当归入杂家著作，因为，第一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言道家，是将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言道杂两家相糅而言盖出史官。第二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是经魏徵之手而成的，魏徵见过《傅子》一书，并将其大量内容引入《群书治要》的。魏徵同意将其置于杂家类，充分说明仅就内篇而言，《傅子》应入杂家也是符合条件的。第三，赵蕤作《长短经》，大量收入《傅子》文。赵氏是出出于儒道，偏好于兼容的杂家，从其思想倾向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^①。

另一种观点将《傅子》归入“儒家”。《傅子》内篇刚写成，时人王沈即称赞其文“言富理济，经纶政体，存重儒教”。南北朝

^① 魏明安、赵以武：《傅玄评传》，第262—263页。



时期刘勰也说：“傅玄篇章，义多规镜。”^① 乾隆年间，四库馆臣特别看重傅子的儒学倾向，称其“关切治道，开启儒风，精意名言，往往而在”，将其编入儒家类。叶德辉认为：“《傅子》，隋、唐《志》及宋《崇文总目》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入杂家，最合流别。今《四库》入儒家，则以所存二十余篇，皆关切治道，阐启儒风，故进而与《中论》《中说》相参乘欤？”^②

《四库全书》根据一小部分仅存作品进行归纳而编入儒家，显然有些粗率、武断，使人对《傅子》思想性质产生误解，因此引起后学的诘难。钱保塘认为《傅子》虽然有浓厚的儒家色彩，但也有法家的倾向。余嘉锡指出了《四库全书》编纂之失，并引文廷式《纯常子枝语》卷三十六分析说：“《意林》引《傅子》云：‘见虎一毛，不知其斑，道家笑儒家之拘，儒家笑道家之放，皆不见本也。’是其学亦兼取诸家，真杂家者流耳。纪文达入之儒家，非是。”^③

平心而论，《四库全书》的作法固然以偏概全，而将《傅子》归入“杂错漫羨而无所指归”的杂家也似有不妥，傅玄的思想还是有所侧重的，“经纶政体，存重儒教”即在政治思想上倾向于儒家，王沈的评断很有说服力。至于“三史故事”“九流杂论”不少谈正心、礼制、仁义、孝道等，内容也倾向于儒家。就《魏书》底本的史料片断来说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脩传》表彰王脩哭亡主袁谭之“义”，《管宁传》注引《傅子》评道“与人子言，教以孝；与人弟言，训以悌；言及人臣，诲以忠。貌甚恭，言甚顺”，也可以看出傅玄敬佩管宁是一位谦谦儒者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刘晔传》注评刘晔：“以晔之明智权计，若居之以德义，行之以忠信，古之上贤，何以加诸？”因此，从总体上分析，《傅子》思想还是偏重

① 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。

② 叶德辉：《傅子叙》。

③ 余嘉锡：《四库提要辨证·傅子辨证》。

于儒家，以儒为主，兼容杂家。

三

《傅子》在唐朝时期还保存得较为完好，唐人编纂的一些类书如《初学记》《群书治要》《意林》等往往可以轻易地从《傅子》中选择首尾完整的材料。经过安史之乱、黄巢起义及五代时期社会动荡，《傅子》的大多数篇幅散佚。到了两宋时期，内容已经散佚殆尽，人们已经无法窥见其真实面目。

现存辑本中，最早的是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的《永乐大典》本《傅子》，称为“大典本”。《百子全书》《增订汉魏丛书》《子书四十八种》等所收入的都是这个本子。明人张溥在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·傅鹑觚集》中辑录了《傅子》的部分文章。

除了《永乐大典》和张溥的部分辑录外，清朝以前没有比较完整的本子。张溥的辑录本有《赠扶风马钧序》《荀何论》《魏武帝拟古皮弁裁缣帛为白蛤以易旧服》《魏尚书何晏好妇人之服》等属于《傅子》的文字，虽然“略为详尽”，但“随得随录，不究六朝人编集之例，又未著原引之书”^①，使用起来很不方便。从前代典籍里全面董理、认真辑佚，并汇总而成《傅子》全帙者，是清朝乾嘉以后，由方濬师、严可均、钱保塘、叶德辉等分头完成，并各臻其美。清朝考据之风甚盛，乾嘉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整理与考据，“其直接之效果，一，吾辈向觉难解难读之古书，自此可以读可以解；二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，吾辈可以知所别择，不复虚糜精力；三，有久坠之哲学，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，自此皆卓成一专门学科，使吾辈学问之内容，日益丰富”^②。

许多学者开始关注《傅子》，对其进行发掘、整理，判定其文

① 叶德辉：《辑录晋司隶校尉傅玄集叙》。

② 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。



字真伪，剖析其文章风格，研究其思想得失，推断其学术源流，取得了重大的成就。乾隆年间，朝廷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，对几千年间浩如烟海的典籍进行收集、钩沉、考证、考辨，编汇成大型丛书《四库全书》。徐步云等人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傅玄政论文章二十四篇及附录四十七条，编为《傅子》一卷，收入《四库全书》儒家类。在同时编写的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中写道：“此本虽残缺之余，尚足见梗概也。”程瑶田在《〈通艺录〉〈修辞余钞〉〈辑逸子书〉三种序》中有补充说明：“纂修官徐步云从《永乐大典》中搜出《傅子》有目者二十四篇，然皆裴松之之所未引者。又有无录目者数条。及旁搜《太平御览》《文选》注中碎事凡四十余条，亦间为裴注所未及引。”^①《四库全书·傅子》所依底本只有《永乐大典》《文选注》《太平御览》等少数书目，尤其在完整篇目的选择上，只依据《永乐大典》，涉猎范围有限，搜集并不完整，《群书治要》《意林》等书中对《傅子》条目收集也较多的诸书，或因没有见到其他版本而不提及，或虽见到但不充分重视，这样如余嘉锡中所评“颇为疏略”^②的弊端也就在所难免。

嘉庆二十年（1815年），严可均参照乾隆后期从日本传回来的唐朝魏徵等人辑订的《群书治要》卷四十九所收录《傅子》文章的顺序编定成稿，又从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中辑出五十五条约六千三百余字、从《意林》《北堂书钞》等书中搜出大量的片言只语，编为六卷（包括诗赋两卷），收入《全晋文》卷四十五至卷五十，其中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为《傅子》的内容，是为“严本”。

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方濬师以《四库全书·傅子》与《群书治要》对校，彼此互勘，正其讹误，顺其次序，“计得篇目三十”^③，编成《傅鹑觚集》五卷，其中卷一、卷二为《傅子》，卷

① 《诸子集成初编·桓子新论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。

② 余嘉锡：《四库提要辨证·傅子》。

③ 方濬师：《傅鹑觚集·序》。

三赋、疏、杂文，卷四乐府，卷五诗。另有补遗一卷，由广州书局刊印，是为“广州书局刊印本”或“方本”。

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，钱保塘目睹《傅子》离散不堪，发奋拊摭，“零章佚句，均为收入”^①，辑成《傅子》二卷，附录一卷，是为“清风室丛书本”。

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，叶德辉辑订《傅子》三卷，另附《订误》一卷。叶德辉以《群书治要》为主，参校《永乐大典》，考订真伪，务求可信。到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叶德辉又辑订《傅玄集》三卷，叶德辉所校订两种傅玄著作辑本，被称为“叶本”或“观古堂所著书本”。观古堂所著书本《傅子》优于他本者，在于叶氏详注出处，卷次及异文等方面，便于人们寻阅。

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傅以礼、孙星华等人博采诸本之优长，又搜集了一些断篇残稿，编为《傅子》五卷，刻入《傅氏家书》是为“傅氏家书本”或“傅本”。傅以礼辑《傅子》也依严本，只是于今整篇者，仍照严氏式。其从各书所采之佚文既多出十余条，五百余字，而各段各句之注文又详细添载，并勘正一条错误^②，因而不仅篇页增多，语句更加精审。傅以礼最初没有得到严本，只据宋书整理。后来见到了严本，又依严本重新编排，所辑内容依据《崇文总目》分为五卷，而改补遗为阙题。后又见到已版的四库聚珍版，不久又见到钱保塘清风室丛书本，一并交给孙星华校勘。孙星华重新校订，又为新定的《傅子》作序言、例言、序录等。该本编排完整、内容丰富，粲然可观，后来被收

① 钱保塘：《傅子·序》。

② 孙星华在《傅子例言》中说：严可均在其间引《御览》八百六十九“管宁之辽东而归也”一条时，“于‘又无火爇’下，忽接‘一门人忿然曰’至‘当得钻火具’云云，语气并不接联。考之《御览》，亦无此三十二字。初疑严氏据有别本，及详细勘阅，始知门人云云，乃《御览》引《笑林》文，盖管宁条‘无火爇’三字，适在此纸之末，其下尚有一页，严氏所见之本，当系偶缺此纸，采录时未及检视，致误以下页《笑林》之文，误联于此”。傅本将此三十二衍字删除。



入《丛书集成初编》，是目前比较容易找到并且可资参考的版本，也是目前所见清人辑本中内容最完整的本子。

此外，清朝时期还出现了其他几种刻本或抄本，如陶宗仪辑、张宗祥校《傅子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排印《说郛》本、王仁俊辑《傅子》一卷《玉函山房续编》本、何治运《傅子》后定本、程瑶田修辞余抄本、钱熙祚指海续刻三卷本、杨凤苞辑本等。另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中讲，清朝时期的《傅子》抄本或稿本有：一、《傅子》一卷，清抄本，清陈沆校。二、《傅子》一卷，清孙氏玉海楼抄本，清孙诒让校。三、《傅子》一卷，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聚珍版，傅增湘跋并录清卢文弨校记。四、《傅子》三卷，清抄本。五、张鹏一《傅子》辑本一卷，存于《关陇丛书·北地傅氏遗书》之中。六、《傅子拾遗》二卷，清抄本。

对古籍的考证、辑佚、校勘、辨伪是清代学者治学的主要方法，学者们在整理《傅子》时广搜博征，对《傅子》的版本源流、文字讹误、篇章的真伪做了认真细致的研究，他们不辞辛苦查对异本，改衍补脱，审核舛驳，澄清了许多谬误。方濬师在编定过程中注意彼此互勘，正其讹字。叶德辉博采群书，务求不漏，于各卷各篇之下，必详注其出处、卷次、异文，对于流传中混入的文字也一一摘出。叶德辉在《藏书十约》中说：“书不校勘，不如不读。”他自己在整理古籍时，尤其注意校勘，根据缜密的分析另作《傅子订误》一卷，专论《傅子》各种流传本的异同，力求补偏救弊，扫却历史尘埃，恢复《傅子》的真面目，如指出各种版本中所收《镜总叙》，实际上是将《韩非子·说林观行》篇误收进去，“读《初学记》镜部总叙引《韩子》文，乃知《大典》误以《韩子》为《傅子》”^①。这些考据工作具有循流导源的作用，便于后人研读，余嘉锡称赞“其说较严氏为尤精”^②。傅以礼所辑《傅

^① 叶德辉：《傅子·叙》。

^② 余嘉锡：《四库提要辨证·傅子》。